

阅读的边界与技艺

读书、读图与读博

(上接9版)2014年起,麦家就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开办了供读者阅读的“麦家理想谷”,藏书上万册。2017年,他又开通了“麦家陪你读书”的微信公众号,计划用20年的时间,以星期为单位,陪伴读者阅读1000本书。“阅读应该成为人一辈子的一种陪伴,爱上阅读就开始了一生的浪漫。”

可以自我复制,更要“突出重围”

“最好训练”和“最好准备”的“化学反应”,让麦家在1986年发布了首部作品。他坦言,当时自己年轻,一开始的写作是希望公开心事,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,而现在看来,这种思想自然是狭隘的。

每每回顾这样的经历,麦家对年轻人更为宽容:“年轻人不可能那么懂事,也不要害怕犯错误。当你尝到了失败的味道时,从一定意义上讲,你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一帆风顺的人生,或许也是一种缺憾,因为你都没尝过失败的滋味。人生就是要尝一些各种各样的滋味,滋味越充足,人生体验就越多,体验多总比少要好。”

在麦家的记忆里,自己的青春与挫折形影不离。他的代表作《解密》从写作到发表历时11年,经过了17次退稿。“在这种挫折面前,人很容易被打垮,好在我没被打垮,就像一块铁,经过千锤百炼变得更加坚硬,甚至接近于钢了。所以人生就是奋斗,奋斗也是人生的最大财富。年轻人一定要有‘初生牛犊不怕虎’的勇气,要学会品尝失败的滋味,历练从失败中站起来的过程。‘后浪’肯定会超过‘前浪’,但是要拿出努力,才能超越,要以奋斗者的姿态来超越。”

而奋斗者的姿态,也就是英雄的姿态。从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《刀尖》到《人生海海》,麦家一直在强调英雄主义精神。“过去我一直理解的英雄是董存瑞、邱少云,今天的英雄可能是环卫工人,或者是作者、记者。我们对英雄的内涵可以有变化,但是世间需要英雄,这是不容置疑的,能够在跌倒的时候站起来就是英雄。”

但是麦家对年轻人也有另一方面的提醒,不能挥霍太多的时间和健康。“当时我趁着年轻,精力恢复快,经常写到凌晨两三点,然后睡到上午十点、十一点,早中饭合在一起吃。但是现在,我发现,生活越有规律,工作越省力。”

在献给父亲的《人生海海》之后,麦家正在创作“故乡三部曲”的第二部,这是一部献给母亲的作品,而第三部则可能是献给百姓。他表示,之前谍战题材的写作已经让自己的积累日渐稀薄。“当然我也可以自我复制,但是我并不甘心,要挑战自己,寻找新的激情。从这一点上说,我也在当那个奋斗者,去‘突出重围’。”

“生活给了我机会”

回顾此前的一些创作,麦家说,当时的“谍战题材热”让自己有些变形,缺少了对文字的敬畏,“那些作品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,为此我也作了检讨和调整,但是代价很大,因为我三年一个字都不敢写,一直在等待重新出发的冲动。”

“后来,还是生活给了我机会,因为我对故乡的感情突然发生了变化,不再对童年不幸福,而对那片土地、那个村庄以及个别人充满怨气。”麦家总结说,随着年龄增长,阅历增多,人看问题会更立体、更客观,更有理性,自己恰恰经历了这个过程,既能谅解对方,也能理解自己,最终达成和解。

麦家的家乡是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蒋家村。它是《人生海海》里村庄的原型,“我写作的时候就是回到了那个村庄,回到了自己的童年,当然里面的内容不是一对一的关系。小说从生活出发,但是要高于生活。”

而高于生活正是作家的责任。麦家觉得,作家的工作就是提炼生活,给生活提纯,给生活炼金,把生活当中像金子一样值钱的东西提炼出来,告诉读者,让他们以后不要犯错。“文学就是人学”,就像数学公式、物理定理一样,我现在就是想对读者、世人,甚至后人,我现在在对人有一些新的认识了,想告诉大家。”

在麦家的作品中,英雄主义精神往往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。麦家表示:“如果没有安定的环境、强大的国家,个人是没有所谓的幸福生活的。国家就像是你身后的一位伟人,让你能安然地站着。”

而作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,麦家一直在关注“中国文化走出去”“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”的话题。“中国文学这些年来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,一点也不亚于其他行业,甚至是领先于其他行业。如何架通中国文学这座桥梁,让它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,是我最关心的内容。”

了“宝物馆”。宝物馆的功能是藏宝,博物馆则在收藏之外,更注重藏品的研究与展出。借助于展览,我们得以了解那已经消逝的历史场景,以及人类日常生活的连续与变异。

更重要的是,我排列1867—1870年游历欧洲的王韬,其所撰《漫游随录》1887年10月至1889年2月连载于《点石斋画报》,其中“博物大院”有曰:“纵令土庶往观,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,用意亦不深哉!”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(1876—1878)郭嵩焘,在其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中,也曾提及此博物馆:“其地礼拜二、礼拜四两日禁止游人,余日纵民人入观,以资其考览。”现代作家朱自清的《伦敦杂记·博物院》(1936)则是:“各院或全不要门票,像不列颠博物院就是;或一礼拜中两天要门票,票价也极低。……这种种全为了教育民众,用意是值得我们佩服的。”由150年前的每周开馆三天,改为现在的每日开放,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;让人感慨不已的是,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,居然还有这种谋其功而不计其利的举动。其实,不只是大英博物馆、国家画廊、国家肖像画廊、泰特美术馆、泰特现代美术馆、维多利亚及亚伯特博物馆等,也都是免费参观。

有感于此,撰写《大英博物馆日记》时,我多次提及博物馆免费的意义。没想到五年后,中国政府一声令下,全国博物馆及纪念馆(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)一律对公众免费开放。从1907年7月19日北京万国园开张,代表中国官办博物馆事业起航,到2008年中国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,百年中国,博物馆事业风风火火,可圈可点。尤其最近十多年,每到5·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,各大媒体都会报道各大城市建设博物馆的成绩及发展规划。顺手抄两则近日的消息,单看标题便一目了然:《陕西全省现有备案博物馆350座 2023年将会新增哪些博物馆?》《2035年北京各类博物馆将超460座》。我的家乡潮州是座四级线城市,经济不发达,但文化底蕴深厚,乃“活着的古城”。潮州人从2016年启动建设“博物馆之城”,到目前已建了80家“博物馆之城”系列馆,计划到2025年,全市建成门类齐全、功能互补、特色鲜明、布局合理的“博物馆之城”体系的各类博物馆100座(《全市“博物馆之城”新增10家系列馆》)。当然,同样叫博物馆,规模有大小,质量有高低,这里就不详加辨析了。无论如何,如此业绩,还是值得大加点赞的。

不过,在《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》中,我仍提及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短板:“那天从香港飞北京,飞机上读《星岛日报》关于内地主题公园增长迅速以及全世界博物馆排名的报道,还是感觉不太舒服。2017年全球博物馆进馆人数排名,法国卢浮宫第一(810万),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二(806万),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第三(700万)。表面上差距不太大,但考虑到国家人口,更重要的是卢浮宫收费,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免费的,不免对中国入观看博物馆的热情无担忧。”什么意思?我想引出的话题是,培养国人阅读博物馆的急迫性。”目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是,建筑比藏品好,藏品比展览强,展览比观众好。最应该用力的,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,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。在我看来,培养中国观众欣赏各式各样高水平博物馆的“雅趣”,此任务一点也不比建三三座或三百、三千大型博物馆轻松。建得起,养得好,用得上,需要政府与民间、学者与大众共同努力。看来,从有钱到有文化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

当下中国,不仅博物馆越建越多,越建越漂亮,且经由政府提倡以及电视、图书、纪录片乃至抖音等各种新媒体的宣传,进博物馆人数大幅度增加。但必须意识到,从“网红打卡”到“深度阅读”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那是因为,博物馆不管是综合性还是专业性,其阅读及欣赏是有一定门槛的,不是随便进去逛一圈,就有明显的收获。帮助普通民众更好地阅读博物馆,这是“另一种启蒙”。在此过程中,专家应发挥有效的引领作用。

我不是博物馆学专家,但对“读博有门槛”深有体会。十九年前,也是美好的“人间四月天”,我有幸到希腊克里特岛旅行。车子左转弯,来到某处米诺斯文明遗址,寂静的山谷中,除了风声,就是旷野与废墟,还有若干静穆肃立的说明牌。对于欧洲人来说,那是西方文明的起源,单靠残垣断壁,也能遥想天外。而我知识储备不够,加上走前忙乱,没认真做功课,真的一下子蒙了。那一瞬间,既惭愧,又懊恼。事后想想,普通民众,若无足够的知识准备与想象力,来到高昌古城那样的遗址,也会有类似的窘迫。所以我会说,不是所有博物馆都能轻易“进入”的。

对于年轻一辈来说,或许“读博”是时尚,“读书”则显得out。其实,阅读须兼及新旧——这里说的,既是边界,也是技艺,还是心情。有古老而醇厚的“读书”打底子,有百发百中的“读图”为侧翼,再加上眼下正方兴未艾的“读博”,三者互为支撑,相互激荡,如此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,方才是“阅读”的理想状态。

(本文为作者2023年3月20日在暨南大学的专题演讲)

这既是我的长项,也是我的短处。具体到“晚清画报研究”,我的策略是有效的。但真正意义上的“读图”,显然必须比我做得更精细,也更专业。记得三十多年前初读台静农的《夜宴图》与韩熙载,大有醍醐灌顶的感觉——图像原来可以蕴含如此丰富的历史细节。而近年阅读巫鸿等人著作,更让我对美术史著所能达到的技术高度与思想深度,有了深切体会。

最近十几年,国人阅读艺术史的热情高涨,读图能力迅速提升,我本再无置喙的能力。去年之所以推出图文书《大圣遗音——中国最简艺术史》,并非有什么新见解,而是追怀十多年前的一次冒险。时隔多年,三联书店将我作为外宣艺术史书籍的长篇导论配上精美图片,制作成图文书,这对我当然是很大的鼓励。但我明显感觉到,最近这一二十年,年轻一辈对博物馆/美术馆的兴趣及阅读能力迅速提升,自己并非这方面的专家,冒险越界的事,一次足够,以后再也不做了。

说到“读图”,除了博物馆与美术馆图册、插图或画报研究、美术史专著,还有本世纪初迅速崛起的“图文书”。过去一讲“读书”,大家脑海里浮现的,就是密密麻麻的文字。其实不然,今天国人获取知识的途径,图像一点也不逊色于文字。故“读图”也是一种“读书”——或者说,兼及文字与图像,方是今天阅读的正道。

任何时代,一旦成为潮流,都会有弊端——因此才有必要“学以救弊”。二十年前我撰写《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——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》,讨论中国出版业的大量使用图像资料,必然对书籍的写作思路以及读者的阅读趣味,造成很大的冲击;我关心的是,在学术类的图文书中,如何继续保持文字本身特有的魅力。文章的结语是——“在我看来,好的图文书,应能同时凸显文字美感、深化图像意义、提升作者立意,三者缺一不可。当然,这样的境界很难实现;只是‘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’。既擅长阅读、分析图像,又颇能品味、保持文字魅力,这很不容易,需要修养,也需要训练。换句话说,读图有趣,但并不轻松——这同样是一门学问,值得认真经营。”

二十年过去了,图文书制作方兴未艾,且越来越精美,而我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,那就是,既对“左图右史”持开放态度,也对“文字魅力”坚信不疑。几年前《文汇报》的副刊“笔会”纪念创办七十周年,我应邀撰文祝贺,题目旗帜鲜明——《依旧相信文字的魅力》。

三、如何阅读博物馆

谈论图文书,让我们得以沟通“读图”与“读书”;而翻阅展览图册,则很容易穿越“读图”与“读博”——这里的“读博”,当然不是指攻读博士学位,而是阅读博物馆、美术馆、纪念馆。博物馆/美术馆收藏历史记忆,收藏人类知识,也收藏一代代文人、学者、画家的趣味与心情。但作为建筑及展品的博物馆/美术馆,一旦落在纸上,阅读视角就应该从“读博”转化成“读图”。

我当然知道“云上博物馆”的美妙,也大致明白其发展前景,不过这不是我的专长,年轻者比我更能适应,也更善于表达。我依然对“纸上博物馆”更感兴趣,或者说更有体会。那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,观看精彩的博物馆或专题展,都会请回印制精美的图册,以便进一步欣赏与阅读。更何况,常因各种缘故无法亲临其境,只能借阅读展览图册卧游浏览。比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2019年1月16日—2月24日举办“颜真卿——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”,以及浙江绍兴博物馆2022年9月28日—12月20日举办“高古奇骇——陈洪读书画作品展”,我都只能翻阅那两册精美厚重的图册,遥想展览现场,远隔千山万水,大呼过瘾。

2006年,首都博物馆举办了“世界闻名珍宝大英博物馆之250年藏品展”,邀请三位学者在展览期间作演讲。第一位是大英博物馆馆长,第二位是首都博物馆馆长,第三位是我。之所以请一个中文系教授去博物馆做讲座,是因为我此前出版过《大英博物馆日记》,反响很不错,中央电视台“读书时间”栏目还专门制作了半小时的专题片《陈平原带您游大英博物馆》(2003年11月)。选择这么一个蹩脚的“导游”,当然不是看中我并不丰厚的学识,而是公众比较容易借此非专业的视角进入这座知识的海洋。还有就是,我从知识考据的角度,努力将“博物馆”历史化。

比如,谈论大英图书馆,我会引入1893年《点石斋画报》上的《公家书房》。要讲收藏,中国人同样源远流长,问题在于,收藏者是否愿意“公开展示”自家所拥有的宝贝。最晚清国人大开眼界的,其实不是洋人的收藏能力,而是其允许公众参观。就好像同样藏书,“藏书楼”与“图书馆”不可同日而语。百年风云变幻,值得欣慰的是,图书馆与博物馆终于在中国深深扎根,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再比如,藏品之进入博物馆,不一定因其珍贵,更可能是因其代表性,或在知识链条上占据重要位置。我多次游览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,常听观众抱怨:这种东西,在我们中国一点不稀奇。晚清时,我们曾将博物馆(Museum)译成



▲陈平原谈读书的三部作品。

沉浸式阅读区最受读者欢迎,书房沉浸式阅读区成为读者预约使用的首选区域。沉浸式阅读区高峰时段(09:00—21:00)年平均上座率达86.43%。”这当然是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,不过我悄悄向当地朋友、读者会不会多为做作业的中学生,朋友笑而不答。

第三件趣事发生在十年前,石家庄某快递员,将我谈读书的一段话,贴在三轮车上,每天招摇过市,广而告之。这个故事,我在《文学教育与成长经验》中介绍过,这里不再详述。

二、不仅读书,而且读图

2016年4月,我在广东省东莞图书馆“市民学堂”开讲,题为《读书、读图与读博》。近日应邀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持的“2023年角楼论坛”演讲,不愿老调重弹,希望根据形势变化及自家思考的推进,回应新的时代话题,于是改为《读博、读图与读书》。两次演讲,都是以“读图”为中介,连接“读书”与“读博”,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。

东莞演讲时,我称:“图像在日常生活中不仅是娱乐,也是一个传播知识的途径,所以今天多读书,不仅仅是读文字,还要读图像。它包括纯文字的,纯图像的,图文混成的书籍,甚至包括有声读物以及影像资料等等,这些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读书人。”

两年后,我的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——晚清画报研究》增订版刊行,且获得深圳读书节“2018年度十大好书”以及第十四届天津图书奖等,使得我谈“读图”略有了些底气。我是中文系教授,并没有受过美术史方面的专业训练,谈“读图”其实有点越界。书出版后,十多篇书评及专访中,答杨早问中的这段话,在我最为念兹在兹:“今天中文系的学生,不能只满足于‘说文解字’,还得学会理解声音的魅力以及图像的力量。我相信,这方面的研究会逐渐多起来。只靠文字来传递知识与情感,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我们必须意识到,文字越来越面临图像以及声音的挑战。”(《陈平原:学会理解图像的力量》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2018年11月30日)

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》共十章,写作时间最早的是《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——以“飞车”为中心的考察》,完成于1996年初。报道说二十年磨一剑,那是夸张,但确实很多年寻觅,在如何阅读/阐释图像方面做了不少尝试。看我早期不太成功的《点石斋画报选》《图像晚清——〈点石斋画报〉》《看图说书——中国小说绣像阅读札记》等,不难看出我的入手处。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,我最初的“读图”,深受鲁迅、郑振铎、阿英等前辈的影响。

虽然也读点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(sir E.H. Gombrich, 1909—2001)的书,也会引点约翰·伯格(John Berger, 1926—2017)的《观看之道》、彼得·伯克(Peter Burke, 1937—)的《图像证史》或者米歇尔(Mitchell, W.J.T., 1942—)的《图像理论》,但说实话,那都是无关紧要的点缀。我真正擅长且用力之处,不是图像阐释,而是借都市文化、思想潮流、艺术观念、印刷技术等,讨论“大变革时代的图像叙事”。所以,我参考及引证的,多是城市史、新闻史、书籍史、版画史、插图史、漫画史等,而不是图像理论。具体论述中,不时闪现阿英《晚清文艺报刊述略》《阿英美术论文集》《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》的身影,还有鲁迅众多单篇文章,如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》《〈朝花夕拾〉后记》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《“连环图画”辩护》《〈北平笈游〉序》《连环图画琐谈》《漫谈“漫画”》等。

我主要关注的不是图像阐释,而是“图文互证”,尤其是凸显图像叙事背后的“低调启蒙”,

陈平原

在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》初版序中,我曾自嘲:“比起传授各种专业知识,劝人读书或教人怎么读书,显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,以致学有专精的教授们,普遍不太愿意涉足。”可说归说,做归做,教了几十年书,难免养成“好为人师”的毛病,每到世界读书日、各地图书节或大学开学典礼等,总经不住诱惑,应邀“读书”。

话说了许多,也收获不少掌声,于是不断有人建议,写一本系统的《阅读学》或《读书论》,阐发阅读的原理、途径、方法、诀窍等。此等好意,我心领,但婉拒。原因是,在我看来,读书是自己的事,别人的经验只供参考,无法复制。至于“诀窍”,我在回答类似提问时,总是闪烁其词,有时说有,有时说无。人家追问,到底是还是有还是无,我就借用人王金若虚《溇南遗老集》卷三十七《文辨》中的妙语——“大体则有,定体则无。”就看你生活在哪个时代、处于何种语境、面对哪一类听众、想达成什么样的工作目标。

比如面对官员,我讲《“休闲时代”的读书生活》,讨论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,以及文化与旅游的结合,如何影响“阅读”的功能与效果;面对大学生或研究生,我谈《漫卷“诗书”喜欲狂》,讨论文学的“物质性”,如作家的生活趣味、文学的生产方式以及作品中对于“物”的关注,辨析其何以成为有趣的学术话题。这些论述,都是针对特定人群,换一批听众,就不那么贴切了。所以,每次演讲前,我都会询问主办方听众是谁。

一、读书三策及其他

面对公众谈读书,我出版过三本书:《书里书外》《读书的风景——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》以及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》。不过今天首先想奉献的,是我不断变化的“读书三策”。

2005年,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,题为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“读书”》,是我跨界谈读书的肇端。文章最后一段:“说到读书的策略,我的意见很简单:第一,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;第二,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;第三,所有的阅读,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,这样,才不至于读死书,读书死。”说实话,除了若干例子比较有趣,“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”,说不上多新鲜。

2013年,我接受《南方周末》记者专访,题目很显豁——《请读无用之书:对话陈平原》。我谈读书,有三个不同的维度:第一,提倡经典,贬斥烂书;第二,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;第三,主张多读无用的书。关键在第三句:“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,过于讲求‘立竿见影’了。在校期间,按照课程规定阅读;出了校门,根据工作需要看书。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,一概斥为‘无用’,最典型的莫过于闲置的书、艺术、宗教、哲学、历史等。而在我看来,所谓‘精英式的阅读’,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,但对养成人生经验、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。”

2016年,我在一个读书活动的启动仪式上演讲,题为《读书三策》,第一策:少读书,才能读好书;第二策:鉴赏优先,批判其次;第三策:自家体会,文火煲汤。

三回野史献曝,各有侧重,也各具特色,若凝聚成三句话,那就是:“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”;“请读无用之书”;“自家体会,文火煲汤”。不过,谈读书,不能光说不练。说到底,读书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,也是一种社会现象,还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道值得流连的风景,就看你我如何定位。这回的演讲,“举例说明”部分,想谈自己读书的三件趣事。

今年春节期间,不少公号在转一篇轻松的访谈《陈平原、夏晓虹:学者藏书,不以珍奇见长》。其中我关于“书太多”的抱怨,让很多读书/爱书/藏书人心有戚戚焉:“书太多也会成灾,它会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。”开玩笑说,买房子,是给人住的,不是给书住的。可是我们实在没办法,因为工作需要,不断地让书占据我们的生存空间。所以我经常跟夏老师发生矛盾,主要原因就是,哪些书应该送走?哪些书可以保留?两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,就会发生问题。我们的朋友比较厉害。他说,夫妇中只要有一人说送走,就送走。我们是两个人只要有一人说留下,就得留下。我再三申请,什么时候沙发上可以没有书,我可以躺在沙发上休息。到目前为止,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。”

第二个故事很励志。2018年起,我兼任深圳南山区文化顾问及南山图书馆第一届理事,于是有了如下雅事。科技发达的南山区,决定设立全自助的智慧型公益书房——南山书房,而且就从我这里开始。2020年12月,首家南山书房·平原轩在百度国际大厦建成,书房面积170平方米,设有沉浸式阅读座位21席,休闲阅读座位27席,收录包括我捐赠的图书150册、编著510册,配备古今中外文史及艺术图书5000册。至于运营效果,据《2021南山区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》称:“南山书房·平原轩自2021年2月1日正式运营以来,截至12月31日,平原轩共开放285天,到馆读者6.4万人次,线上预约共开放12万人次。书房沉